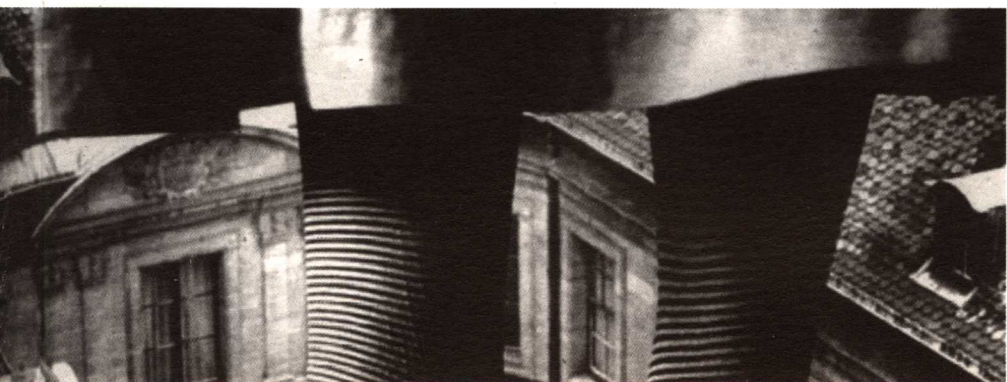


The Second Stage



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

第二阶段

[美] 贝蒂·弗里丹 著 小意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Betty Friedan

汉译精品 · 思想人文

第二阶段

[美] 贝蒂·弗里丹 著 小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阶段/(美)弗里丹著;小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

(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书名原文:The Second Stage

ISBN 978-7-214-04522-5

I. 第… II. ①弗…②小… III. 女权运动-研究-美国
IV. D4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623 号

THE SECOND STAGE by Betty Friedan

Copyright © 1981 by Betty Fried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46

书 名 第二阶段
著 者 [美]贝蒂·弗里丹
译 者 小 意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22-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序

一提到女权,大部分人的联想就会是一群叫叫嚷嚷的极端分子,然后就由这种联想激发一些评论,大抵也就是对极端主义的反对和嘲笑。对事物不求甚解但热爱评价的精神一直在耽误我们对一切的认识,包括女权主义。

贝蒂·弗里丹的《第二阶段》写于 80 年代的美国,但对如今的中国女性仍然有指导意义,或者说,无论对男性女性,对一切希望能在平衡关系中生活的人们都有指导意义。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男女关系的平衡,房子和收入的平衡,孩子和工作的平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在这所有的问题中生存,从来没有想过这并非我们个人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如何才能解决如今生活中复杂多变的问题,我们只是一再忍耐,告诉自己,生活就是这样的。的确,这一切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显然是太过复杂,于是那么多城市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无论属于哪一个收入阶层,在充满经济压力的生活之中,在离婚机率和迁移机率激增的社会之中,就算感觉无力,也毫无办法。

在《第二阶段》中,弗里丹为 80 年代的美国女性,为当今的我们,指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运用这种方式,许多棘手的难题,也许存在某种解决的可能——只要我们愿意改变习惯的思维,不要害怕改变,不要一听到变化,就产生抵制情绪……让我们,生活在矛盾之中的男男女女们,在承受物质和生活压力的同时,愿意挪出一点时间,听听弗里丹当初为美国女性指出的某种道路,也许,这也是我们需要

的解决之道。

严格意义上来说,大部分人对女权的理解不过是一种误解。经历这几十年剧烈变革的中国人,中国女人,对真正的女权历史也了解甚少,通常也拒绝了解,生怕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影响自己的女性气质。甚至,在我们其实已经是女权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之时,还在下意识地排斥女权这个概念。

其实,所谓女权,在初始时期,女性长期居家,照顾家庭,主要的任务是走出家门,接受教育,进入社会。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如今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女权的使命已经不再仅仅如此了,如今的女权,涉及到的是生活本身:男女共同面对的经济压力,不合情理的家庭结构和房屋设计,和实际生活脱节的育儿设施和工作时间。总而言之,新女权的概念是涉及所有人的,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打算建立何种形式的家庭,一个多元化多价值观的社会是必须的,而所有的社会服务,也理应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服务……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自己?如果大部分的人仍然愿意保有误解,以求不变的安全;如果无论女权事实如何,在人们心里,宁愿它仍然是声嘶力竭极力反抗受剥削的弱势形象,家庭和生活面临的这些问题,该由谁解决,怎么解决呢?

回忆到自己初出校门,步入社会之际,甚至在童年之时,也曾有过这样的痛苦和幻灭,一直在寻找出路,甚至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也许,也是中国的新女性,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女性,甚至80年代出生的女性,坐下来思考生活的问题之时了。在这个物质社会的强压之下,追逐女强人的梦想,迁移造成的情感幻灭,对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忽视,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了太久。

我强烈推荐这本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算得上艰涩的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的翻译作品,而是因为它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有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活得更完整、更丰满、更幸福,我们就应该寻找通往这一切的方式,包括阅读。

另,去年,2006年,我开始翻译本书之时,本书作者弗里丹去世,在此,也向这位指导并且改善了众多女性生活的伟大女性致敬。

2007年3月27日,小意于北京

序言,1998 年

我以前写到,人们宣称女权运动已经结束,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说我们应该宣布胜利,叠好帐篷,然后走开。

毫无疑问,妇女运动改变了美国社会。为男人、女人打开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对女性的奥秘怀旧式的渴望仍然存在,但是不再仅仅根据各种关系——性关系、母子关系、家庭关系——都是和男人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身份。女性用自己的社会行为定义自己的身份。尽管女权运动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为女性争取了一部分平等权利,但是这种胜利并不完整。举两个最简单明显的例子:男人每收入 1 美元,女人的收入则不超过 72 美分;而且无论是商业、政府还是高级专业领域里,决策层里的男女数量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就平等参与社会主流生活的机会这个简单目标而言,表面上我们可能接近平等,但是仍然有差距,特别是顶层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是仅仅提出些我们进入第一阶段时的男女比较问题就可以弥补得了的。一些年轻的女权主义作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女权主义的“第三阶段”,让我觉得又好笑又沮丧。事实上,我们连第二阶段还没有抵达。男女平等在文化上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除了宗教权利这一广大领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已经过时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身处这种结构,女性不管是在家工作还是在外工作,其巨大的压力、毫无必要的负罪感和不断产生的绝望情绪大致是相同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时,女

性的薪水是男性的 90%，不算平等，但是还算接近。然后，怀孕会降低女性的收入，大概到男性的 70%。现在，是我们考虑向我先前提到的第二阶段前进的时候了。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家庭，这些家庭怎么才能到达我们为之奋斗的平等，共同生活。

第二阶段是我们必须前往的方向，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积极的政治意识，让我们超越男性负责工作决策，女性负责家庭琐事的生活模式。这种两性分立的模式极具破坏性，大家不可避免地认为，要孩子是女人自由的选择，而要孩子就等于愿意永久性地削弱自己的收入能力和职业前景。事实上，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力量是多么强大。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1996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女选民比男选民多出 17%。克林顿再次担任总统，就是因为那些妇女关注的问题：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以及教育问题。女选民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女性也以更大比例占据了劳动力市场。这些力量应该用于重新构建她们的工作条件、社会地位以及已经在改变的家庭角色。

现在，距我第一次提出，如果男人、女人、孩子想要在我们追求的平等之中生活，我们需要前进到“第二阶段”，已经有 17 年了。那时候我相信，现在更加深信不疑，家庭这种组织，或者说，现存的各种不同家庭，都是女权主义新阵地。我们必须改变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现有的事业发展方式的默认规则就是，每个劳动者家里都由妻子在照顾生活，我们也要改变这种事业发展方式。本书呼吁重新构造家庭和工作的 17 年来，现实中，尝试以新的平等条件生活的男男女女，已经发生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但是仍然没能步入正轨。女权主义理论沦为受害者，仍然在关注性别政治，这和现实并不吻合。现在，是我们思考并且行动的时候了：妇女作为新的大多数人，究竟能够赋予自己多少权利？那些用背包背着孩子的男人们，那些让妻子分担家庭一半经济责任的男人们（或者至

少习惯了妻子也有收入的丈夫们),都是我们的同盟。现在超过50%的美国家庭都是这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今最重要的政治需求就是,把工作和家庭关系重构列入美国政治、经济议程。

女人不能落入工作的传统权力游戏中,也绝不能被性别政治事件破坏了情绪,因而转移了注意力。对堕胎问题的歇斯底里,是那些被妇女独立吓坏了的人的绝望叹息,他们不敢迎头痛击,只好试图让我们把所有精力花费在堕胎问题上,一遍遍为之战斗。当他们一致地把堕胎问题视为女权问题时,我担心女权运动就此掉进了陷阱。每一次的社会调查都显示,尽管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是有矛盾和争议的,比如未成年人流产,但成年女性有权利选择堕胎是全体国民的共识。女性当然有选择要不要、何时要孩子的权利,这是女人最基本的人格权利。当避孕失败时,堕胎是法律帮助实现这一权利的必要手段。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人们将来不会使用这一方式,堕胎并没有好处。不论是堕胎,还是性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是女权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平等参与政治经济的决策权。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女人在家还是外出工作,和男人都以平等为基础生活。是应该长大的时候了,应该超越是否要孩子、如何保留我们的青春美貌这些问题,如今女性的任务是,认识到长达80年的生命周期带来的新挑战。63岁的老年妇女怀孕的报道,或者让我们觉得好玩,或者吃惊。我理解,应用新技术来满足人们心愿的确很有吸引力,但这么晚生孩子,我觉得是无能的信号——如今的我们无法把握对男女都已经敞开的的生活。这当然不仅仅是女人的盲目。50、60甚至70岁的男人决定和年轻女人结婚,这种现象远比60岁的女人怀孕更加普遍——也同样是捕捉青春的幻觉。尽管花在化妆品和整容上的钱有上百万美元,但总体来说,女人面临的最实际的挑战是生命周期的延长,以及这个周期中的每一阶段。

我们竭力以第二阶段的方式生活,尽管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制度性的调整。但是,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日程安排、办公时间的调整,以及相

应新产业的出现,都是用来满足新需求的。举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例子,外卖和遍地开花的便宜的民族风味餐馆,许可生产的食品,能让母亲们工作一天后从烹饪中解放出来,全家人一起外出吃饭。这是家庭适应方式中的一种。

绝大部分在外工作的女性有不同程度的舒适、压力、罪恶感、绝望,以及快乐。但是她们全部得接受陈旧的男性工作模式。今天的女性,构成了一半劳动力供给,获得了40%的专业学位,她们没有妻子在家打理家务——当然,现在的男人也没有。渐渐每一个家庭都将找到分担家庭责任以及照顾孩子的办法,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可能还有许多不必要的罪恶感。目前,公共政策并没有足够地面对重建制度的需要。现在的男女,需要的不是63岁时要孩子的权利,而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要孩子,却无须付出过度的代价,或者面临事业的两难选择。如今的技术条件(不算城市的交通堵塞)推进了弹性工作制,错开了上下班时间,每周工作日也不再固定。

但是,对我而言,平等不只是共同照顾孩子、重新安排工作时间。男人和女人一样,都要面对这漫长的生命跨度,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将有两个甚至三个交叉的生命轨迹。把工作、学习、家庭责任、照顾孩子放在一起,再加上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智力层面的个人探索,就是一幅80年时间跨度的七彩画。男人和女人都会因生活的丰富多彩而快乐。在权力简单定义男人的身份的时代,比如赢得了你死我活的疯狂竞争,就算是男人各方面都失败,至少还可以支配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独立自主确实是很大的威胁。很显然,男人们为了自己,同样也为了女人,都得打破这种所谓的男子气概。如今,看起来他们确实是在这么做。几年前,我很高兴地看见《纽约时报》上的大标题,宣布美国男人并没有承担家务的50%。我想,《纽约时报》认为男人有可能承担50%的家务,并且因为他们没有承担就上了头版,实在是太好了。还有,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在“女性的奥秘”中长大的儿子们,当年他们的母亲得帮他们拣起掉在地板上的睡衣,现在他们竟然

能够承担 30% 的家务(当然,男人不熨衣服,不过,女人也不熨)。那些背孩子的男人们,那些帮助照顾孩子的男人们,那些对生活更感兴趣,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竞争的男人们,不至于因此比妻子早死八年。

女权运动放慢了迎接第二阶段的步奏,因此造成了对女性自身的损害。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反而没有优秀的公共和私人基金的、弹性收费的国家儿童保育系统? 如果女性需要,就应该有权利要求国家儿童保育系统的政治优先权。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不拿薪水的双亲假,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拿薪水的双亲假,或者不拿薪水休息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双亲假,而不会失去工作呢? 为什么妇女不但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还要变成工作狂来适应男性的工作模式?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只能导致全社会对那些试图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母亲们的抵触情绪,正像现在多数人那样。

媒体谴责那些父母,实际上是在指责母亲们,认为她们是因为贪心才选择两人都工作,反倒不如削减生活费用,让其中一人(大家来猜猜是哪一个?)呆在家里陪孩子。事实上,至少有 1/3 的夫妻面临工作选择时都会考虑多待在家里,抚育孩子的工作也分担得越来越平均。在家工作的自雇型劳动者每年以 7% 的比率增长,并且发起了“自愿简单化”以及父亲责任运动。民意测验显示,相比增加薪水,大部分男女更愿意和家人共度时光,或者把时间花在个人爱好上。但是小规模的个人调整,相对于根本上僵化的体制远远不够,第二阶段人们必须关注的是,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缩短每天工作时间,国家给予儿童保育优先权。

相比 20 年前,我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现在的我更觉得,当我们平等地生活,坚持向政治家以及大老板们索要生活的优先权,旧有的性观念将会有所改变。旧有的性观念是在残害性,目前我们则体会到一种新型的,也更加实际的概念:性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们也广

泛接受未必像奥兹和哈谢特^①的那种家庭,但总归也是家庭的,家庭中不同方式的爱情。于是,第二阶段就是,男人、女人、孩子,无论如何组成家庭,都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随着时间调整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让我们的生活充实饱满的方式,接受新的政治挑战。我们为女权运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可能性而高兴,为女权运动将社会推进到第二阶段的新阵地而高兴。我希望我能活着看见我们到达第二阶段。

^① 美国 1950 年代一部电视剧的两个主人公。该剧为真人演自己的生活,连角色的名字都和演员一样。

序 言

1989年8月26日,我飞到塞尼卡福尔斯。1848年,我们女权主义的先驱(伊莉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B. 安东尼[Susan B. Anthony]以及其他人)在此第一次聚会,宣布了她们的的女权主义意识。

选举权曾经是先辈们的目标,而现在已经拥有选举权70周年了。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庆祝全国妇女平等日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济济一堂,共同面对高等法院撤销选择权。

一年之后,布什总统否决了双亲假法案,并且威胁要否决儿童保育立法。各路媒体对女性的描述越发趋于传统。显然,我们必须迅速前进,步入女权主义的第二阶段。已经耽误得太久了。

1989年8月26日,贝蒂·弗里丹在国家妇女名人纪念馆演讲全文,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

1970年8月26日,大约二十年前,妇女获得选举权的50周年,我号召发动为平等而战的全国性罢工。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是罢工,因为事实上,那时我们不知道女权运动能达到什么规模。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国家妇女组织、国家妇女政治核心会议、全美堕胎行动联盟,这些我帮助建立起来的组织都刚刚启动。但是很显然,这些组

织没有一个能够把显然已经存在的平等权、女性人格、女性的声音和命运事业结为一体。我们必须向我们自己以及整个国家证明我们的力量。“女性的奥秘”存在了这么多年,本不应该大惊小怪的各路媒体,还在试图把我们说成“焚烧胸罩”的人。所以,我号召为平等举行一次全国性罢工,一些国家妇女组织的姐妹们帮助我组织了这次罢工。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来罢工了:一些尚未参加妇女组织这类传统组织的年轻激进主义者;传统妇女组织的女性(倡导妇女参政的老前辈、青年女性联盟、妇女和平罢工协会),还有职业妇女,包括海伦·柯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以及其他杂志的编辑们,以及一些刚刚从工作的办公室、博物院、医院走出来的女性。那次罢工真是奇迹。它是自赢得选举权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妇女罢工,总共有5万人走上了纽约的街头,其他大城市、小城镇的罢工人数也大致相当。在东汉普顿,我们在海滩上游行。我们呼吁,“罢工已够热,请不要再用熨斗。”我们让丈夫们烘烤准备义卖的蛋糕,而我们去游行。20年前,我们游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承诺——工作和教育的平等机会、发出女性自己的政治声音、安全堕胎、幼儿看护。之后,我们成立了严肃的组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之后年轻女性的生活机遇。

如今,现代女权运动已经爆发了20年。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们生来拥有这些权利,她们觉得很确定、很安全,于是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是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的一代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想当个宇航员。”“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要上法学院。”“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当高等法院或者参议院的法官。”

今天,在高等法院拿走宪法赋予我们的最私人、最基本的生育决定权之后;在我们赢得的有关反工作及教育性别歧视的法律遭遇攻击之后;在布什政府的稀释、缩减,甚至实质上停止采取积极行动之后,现在这个国家年轻的女儿们,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的一代人,奋起捍卫我们以往就已赢得的权利。在今天,在这里,在塞尼卡福尔

斯,我向年轻一代发出呼吁,不仅要加入母亲们的队伍,要参加这尚未完成的革命,还要引领停滞的女权运动走向全面平等,带它步入第二阶段。

我们正处于风口浪尖,人们普遍认为,女儿们,也就是那些 40 以下的女性,那些在生育高峰出生的女性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大众传媒播下的“新女性的奥秘”的种子,种下了这个巨大的误会。大家都知道,“女性的奥秘”是 25 年前我取的名字,意思是指传媒赋予女性的形象,因此被所有时髦思想的媒体、甚至被妇女自己接受的女性形象。那时候,女性的惟一身份就是和男人的关系,男人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满足丈夫、孩子的物质要求,照顾家庭,她们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人。这种形象消除了人们对女权主义先驱者的记忆,以及她们上百年来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这种形象使“职业妇女”、“女性权利”、“女权主义”变得令人忌讳,导致这些概念在年轻女性的意识中根本不存在,哪怕是在最好的大学里也听不到这些词。25 年前,在《女性的奥秘》出版前,不论一位女性是多么想要丈夫、孩子、家庭、家用设备、地毯、洗碗机,但当她一个人时,她想知道“我是谁?”,她就会觉得,世界没有她没有什么不同。她以为这是她个人的问题,唯有她很孤独,别人没有同感。她有问题,她只能到忏悔室,或者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忏悔。

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开始为问题命名,我们打破了女性的奥秘。我们宣布女人是人,她们也有人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然后我们就开始行动,迅速地行动,索要我们的基本人权以及生为美国人的权利,平等的权利,对有关自己的命运的决定发表看法的权利。我们已经让反性别歧视的立法得以实施。我们赢得了《积极行动计划》^①。我们提起了共同诉讼,并且赢得了胜利。我们改变了

^①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积极行动计划》,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由美国政府启动,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某些优待和照顾。——译注

语言。我们从高等法院赢了罗诉韦德案。^①男人起草的《宪法》和《权利法案》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它所提到的人民其实指的就是男人,现在我们要演绎它,保证女性控制自己的身体以及生育过程的基本权利。女人有权利听从自己心灵的指引,为自己做决定,决定到底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要多少个孩子,并且享受安全的、合法的各种妇育医疗手段,并且在必要时堕胎。对女性来说,这是人格的基本权利。

接下来的里根和布什政府,是对女权宣战的 10 年。他们企图把女权主义这个词变成污言秽语。《平等权利修正案》^②失败了,持续的歇斯底里的反堕胎浪潮也出现了,它们声称是在捍卫生命。这种捍卫“出生前”生命的潮流并不捍卫女性的生命、权利;也不捍卫女性的责任——只把想要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这样的生命才能得到养育关爱;它们更不是捍卫孩子得到保育的权利;女性工作谋生的权利;以及女性对家庭和事业的双重责任。它们无耻地把胎儿当作武器,用来攻击女性的生活和人格。它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关爱生命。它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数。民意测验显示,不论是哪一代女性,坚信平等和选择权的才是大多数。但是有时,当任何一方出现极端的倾向,或者变得歇斯底里时,强大的煽动势力迅速将这种倾向席卷开来,就连政治家也不再相信民意测验了。

近年来,新一代女性起来反抗:是的,有了生孩子的选择,但这选择还不够好。美国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以外,惟一没有儿童保育以及双亲假的工业强国。所以,人们不得不推迟生育,有的一直推迟到 40

① Roe versus Wade, 罗诉韦德案, 美国最高法院对有关堕胎问题做出的最重要裁决之一, 1973 年以 7 票对 2 票通过, 认定政府无权禁止堕胎, 从而确立了堕胎的合法地位。——译注

② 1972 在美国议会上通过, 规定不能因为性别原因否认或限制公民的平等权利, 但一直未取得多数州的通过, 因此不能成为法律。1982 年, 这一提案因逾期未获批准而成为死案。——译注

岁。因为晚育,又没有合适的抚育和双亲假,新一代女性无法调节家庭和工作的冲突。因为被迫去维护很久以前我们就赢得的权利,女权运动只能停滞不前。里根时代的政治方针制约了社会规划的发展,且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并不关心儿童保育和双亲假。于是,女性又把这些当问题当成是个人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二者兼顾”成了挖苦,仿佛女人并不应该家庭和工作二者兼得。你能在媒体里看见新的传统主义思想——女人应该放下公文包,抱起孩子,围上围裙回家去。但是经济现实却是,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成就,而是因为迫切的经济需要,让处于各年龄层的大部分美国女人外出工作,有的甚至孩子还很小。只有两份薪水才能供得起房子、付得起学费。单亲家庭非常艰难,而且这种家庭通常也是女人在支持生活。

政治家和媒体错误地理解女性 in 家庭、事业和孩子中的挣扎,以为女人并不在乎她们的权利。他们的误会如此之深,所以上届总统选举中,布什公开反对选择权,民主党也没有起来对抗,以争取女选民的投票。贝拉·亚比茨格(Bella Abzug)和我以及一些女性领导人当时正在制作一个女性关心的问题的传单,打算在埃莉诺·罗斯福^①生日那天散发。我们想提醒女同胞们布什赢得选举会对高等法院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已受高等法院保护的一些女性权利造成的影响,比如隐私权。但是民主党那边,杜凯吉斯^②的顾问们,包括一些身陷“新女性奥秘”的女性,不愿意让我们提起这件事。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处境的这个可怕误会,不应该责怪任何一个党派。一个党也许责任更大,但另一个对此听之任之。这对两党都是一个教训。

①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第32届总统罗斯福的夫人,曾对《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起草和通过起到重要作用。——译注

② Dukakis, 1999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